

★ 长城瞭望

精耕细作才会精确制敌

——坚持按纲施训实战实训系列谈②

■王宁

“你的枪号是多少”“一颗子弹有多重”“战备背囊里该装什么物资”……

贯彻落实新大纲实践中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,往往是反映练兵备战质量的“晴雨表”。

业精于勤,兵精于细。在叙利亚战场狼烟四起、“丛林法则”在某些国家博弈中仍未改变的当下,身为军人,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打仗的本领练好练精。

战争是最严酷的审计师。未来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场上,战斗力的表现形式已由兵力、火力和机动力的物力集中转变为信息力的精准释放。可以说,未来作战就是精确作战,未来战场就是精准化战场。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,任何一处疏忽

大意都可能引发“马蹄铁效应”,影响战争全局。平时训练唯有与战时需求相衔接、与战斗力生成要素相契合,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应付自如。

建设世界一流军队,需要一流的训练水平。如同工人做工、农民种地一样,军人把汗水洒在训练场,也要讲求“性价比”。让每一滴汗都洒出效益、让每一颗子弹都射出战斗力,应当成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共同追求。

训练上的精细,决定战斗中的精准。新大纲把科学练兵、精细管理、集约高效确定为指导原则,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训练资源向战斗力转化的效率。落实新大纲要求,需要我们拿出“绣花”的功夫,从一点一滴抓起,一分一秒算起,一步一动练起,持续培养精细化训练素养,促进军事训练向精确计划、精确组织、精确考评、精确保障发展。

用兵打仗、运筹帷幄,“庙算”的核心是精算、细算。辽沈战役中,指挥员从缴获的武器、击毙的敌军官兵比例中发现端倪,断定敌人指挥所已经撤离,于是果断下达追击命令,一举俘获廖耀湘。江山岛登陆作战发起之前,指战员们除了察探敌情和气象水文外,还说“登陆船抵岸易撞岩”“抢占滩头阵地时战士鞋中容易灌沙粒”等细节问题,研究出“用汽车轮胎挂船舷缓冲”“用布袜子缝在鞋帮上”等方法。正是凭着一丝不苟的精细,我军官兵取得了“三小时攻克一江山岛”的辉煌胜利。实践证明,善于关注细节、利用细节,就能拨开“战争迷雾”,增加打赢胜算。

“图难于其易,为大于其细。”过去,训练粗枝大叶的问题比较普遍,演训指令往往是“炮火猛烈覆盖”“给我狠狠地打”,作战问题定性分析多、定量分析少,粗略估量多、精确计算少,量敌用兵、量敌用弹做得不够……这是与现代战争精确打击、精确释能的要求不相符合的。这类问题不解决,就会成为制约训练质

量提高的障碍。

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,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冰面上。同理,现代作战是体系作战,一些似乎不起眼的“小事”,都可能影响整个体系的成败。如果忽视微小的积累,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,就难有质的飞跃,提高训练水平就成为一句空话。只有向末端问效、向细节要战斗力,切实把精细融入战备训练之中,才能真正练就过硬的打仗本领。

当然,精细化训练不是事无巨细,也不是“钻牛角尖”,陷入“繁瑛哲学”的窠臼,而是通过转变以往粗放式、“大呼隆”、“一刀切”的训练方式,使训练场上定性的要求定量化、模糊的要求具体化、零散的要求系统化,切实把训练研得精一些、抓得细一些,多考虑一些“意想不到的”细节,从而在战场上棋高一着、胜多一筹。

(作者单位: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)

★ 谈训论战

「和平病」只能用真刀真枪来打败

■夏宗长

部队还是要练,不采取实战化练兵,不加强练兵的力度,就无法消除“和平病”。

习主席这一“两会金句”,引起官兵持续热议,也给如何根治“和平病”开出了“药方”。

练兵力度越强,“和平病”就越少。革命战争年代,我军指战员整天备战打仗,睡觉吃饭都得想着防敌人偷袭,哪会有什么“和平病”?到了相对和平时期,少数官兵心中的弦松懈了,敌情观念淡薄了,练兵备战的强度下降了,“和平病”就随之生长。朱德说过:“训练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,成为党无战不胜、无坚不摧的铁军,乃是我们部队目前重要的任务,特别是环境比较安定的部队,更应如此。”朱德的话警示我们:处于和平环境下的部队,苦练不忘、精武不止,就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“和平病”。

有一本书讲述了健锐营的蜕变。健锐营曾是满清八旗兵的精锐,早年因“聚众无他诱,勤操自致精”名噪一时,取得著名的金川大捷。但到了道光年间,懒惰骄奢之风弥漫,训练废弛,军力锐减。骑射和马上原是八旗兵的看家本领,每周都要进行骑射训练,可后来“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”,以致“十人上马半数落,龇牙咧嘴腿骨折”。全营火炮打靶,竟无一人全部命中。当年“威若雷霆,动如风发”的八旗兵成了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,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,不堪一击,屡战屡败。由此可见,一旦荒废了训练,“和平病”就会愈加严重,直至无药可救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军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,增加了练兵的强度,纠正了一些比较明显的“和平病”。但用战斗力标准来评判,用实战的标尺来衡量,用强大对手的实力来对照,我们的训练强度仍显不足,一些“和平病”仍然顽固地存在。比如,以不打仗的心态去做打仗的准备,戴着安全的“紧箍咒”施训,练兵备战的“二八现象”,研究现代战争积极性不高,适应新体制“三转”不够等等。这些问题,单靠教育整顿不能完全解决,只能用高强度的训练逼一逼,在真枪实弹、真训实练、真考实训中全面消除。

怯敌还是艺浅,善战必定艺精。当年威继光的部队,刚开始也有怯敌的“和平病”,但经过严酷训练,终于练出自信,提振了士气,从而战无不胜。训练力度增强了,训练环境复杂了,训练课目变难了,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,官兵的战斗作风、虎气血性、良好心理、打赢能力自然就上去了。缺少强度难度,是不可能成为狼狠之师的,也不可能在与敌作战中所向披靡。

训练力度强不强,一个根本前提就是看是否把训练摆在战略地位、放在中心位置,是否真正做到训练人员、时间、内容、课目的落实。我们反复讲的“二八现象”,根子就在于训练人员未落实。如果训练人员落实了,就不会有那么多人“推材料”、那么多训练计划被取消、就不会形成文山会海。打赢战争不靠材料靠实力,人员不训全,内容不训精,“二八现象”就难以根除。

训练力度强不强,一个重要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把打赢放在首位。有人一抓训练,就消极保安全,刮风下雨、电闪雷鸣时不敢训,这本身就是一种“和平病”。殊不知,安全不是保出来的,训练力度强了,安全才有保证。各种险难课目、极限课目、挖潜课目都没训过,一旦上了战场,不出事才怪呢!只有增强训练强度,多设险局困局难局,逼着官兵想办法去解决,才能提高应对风险、化险为夷的能力。动不动就强调安全事故,哪还有什么训练效益?新一代《军事训练条例(试行)》明确指出,“不得以安全为由简化训练内容,降低难度强度”。事实证明,训练强度有了,安全本领才会高,“和平病”才没有存在空间。

悠悠万事,练为最要。“和平病”只能用真刀真枪来打败,用实战化训练来战胜。全军官兵都按照实战标准练起来,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遵循实战要求和战争节奏,哪里还会有那么多“和平病”?

(作者单位:河南省商丘军分区)

★ 长城论坛

「不习惯,说明作风在转变」

■车金虎

一位领导带机关的同志下基层。大家一起坐火车、换汽车,径直到达连队,与官兵同吃同住,宿舍和会议室里清茶一杯。有的同志开玩笑说:改作风改得不习惯了。这位领导说:“感觉不习惯,说明作风在转变。”这话很有道理。

现在,从地方到部队,从机关到基层,作风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,逐步进入新常态。但也有少数同志表现出一些“不适应”“不习惯”。有的觉得风光不再了,有的感觉官不好当了,还有的认为当官没有意思了。这种“不习惯”,一方面说明作风建设确实取得了成效,另一方面也说明还有人没有把作风变为好习惯,没有把被动适应变为自觉行动。“不习惯”的思想不克服,不良作风一遇气候还会卷土重来,已经解决的问题还有可能死灰复燃。

习惯有好坏之分。坏习惯容易形成,好习惯养成不易。

“今天弄点油,明天弄点面,后天再弄点衣服,两三天之后就习惯了,非搞得自己不行!”这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期说过的一句话。有一次,工作人员把他的棉裤洗了,快到中午,他还在炕上批阅文件。萧劲光以为他病了,一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,就马上让警卫人员领一床棉被和棉衣来。毛主席坚决不要,并对萧劲光说了上面一席话。

“两三天之后就习惯了”,这无异于一记警钟,不光回响在延安时期,也回荡在今天的现实生活。

曾几何时,在一些单位、一些地方,养成许多不好的习惯。一些人习惯于大吃大喝、排排场场,习惯于前呼后拥、迎来送往,习惯于以权谋私、搞特殊化等等。这些不良习惯与作风,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,影响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。像洪流激荡污泥浊水,似罡风扫除狂沙雾霾,我们党以铁的决心、铁的措施,坚持不懈正风气、转作风,使党风为之一新,政风为之一清,人心为之一振,问题积弊为之一清扫,许多坏习惯得以改变。

好作风如清风拂面、洒落人间,如蒙蒙细雨、滋润大地。但因为一些人的“不习惯”,便生出许多奇事怪事。比如,个别人用矿泉水瓶装白酒,用大拼盘减少菜的数量。这说明,好习惯养成不容易,坏习惯不抓就反弹。让“不习惯”成为习惯,必须不断巩固作风建设的成效,坚持经常抓、抓经常,使制度措施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,使每个人真正习惯于新常态,绝不能让那些感觉“不习惯”的人,回到过去的老路子上去,回到过去的坏习惯上去。

一种习惯的养成是不得了的事。清代的刘蓉,在其养晦堂之一室读书。俯而读,仰而思,思而不得时,就在房子里来回行走。时间长了,地上被踩了一个坑。后来,他命童子把坑填平了。可他每次走过时,觉得就像有土隆起一样,不自觉地把脚抬高。他由此警醒道:习惯的养成是多么可怕啊!

这个故事,对我们同样有启发:好的习惯要不断巩固,坏的习惯要时时防备。

(作者单位:武警后勤学院二大队)

★ 基层心声

留笔迹不如留足迹

■张海涛

一位领导同志下基层检查工作,发现各类计划制定详实,各种登记填写齐全。可当一项一项检查时,发现许多并没有落实。这位领导讲评时说:“留笔迹不如留足迹。计划再科学,登记再认真,没有落实,等于白搭。”

笔迹是写出来的,足迹是走出来的。把措施计划留在纸上,不如付诸实践、落实于行动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,“拿起鞋套,脚一蹬就走”,行走于田垄之间,埋头于稻浪之中,取得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性成就。试想,如果不是脱鞋下田,扎扎实实地干,而是闭门造

车、纸上谈兵,怎么会有我国杂交水稻研究事业的辉煌?

没有十二分的付出,就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个别人在动嘴动笔上下的功夫大,在动手动脚上用的功夫小。有的工作没展开,宣传阵势已经拉开;有的工作刚开始,经验已经出笼。这些行为,不但没有赢得声誉、留下美名,反而留下笑柄、留下骂名。为政之道,崇实戒虚。妙笔即使能生出花来,也结不出半粒果实。再好的计划措施,如果不付诸行动,纵然刻在脑门上、写在心里,也是没用的。



某连队在组织战场救护训练时,发现个别对抗小组安排身体较小、体重较轻的战士作为“伤员”,“不待见”那些身材高大、结实健壮的“伤病员”。发现问题后,连队干部严肃指出:训练中拈轻怕重,上了战场哪会有选择余地,难道因为受伤的战友不易搬运就要放弃吗?他们及时纠正这一现象,把严实训

训落实到每个环节。这正是:搬运伤员拈轻重,体型壮的不想动。战场岂能图轻松,平时就应练硬功。

洛兵图 郑建坤文

★ 玉渊潭

“抄撮体面话头”

■一丁

毛泽东“于近人独服”的曾文正公,他的家训苦口婆心,一片深情,透露纸上。

从处世做人、品德修养,到家常日用、出将入相,无不涉及,无不训诲。就连读书写作的经验,也是悉心教授,和盘托出。读的亲切有味,用之实在管用。他对自己的兵将将士,恐怕不会这样说的吧!

“抄撮体面话头”,就是他写给儿子的信中说的:

“尔作时文,宜先讲词藻,欲求词藻富丽,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。”我辈可勉强谓从文之人,带兵打仗是不会的。说这几句话好,是因为多少有一点自己的体会,与“婊子看戏、随人说话”略有不同。

后来,陈康祺把这几句话原原本本地抄在他的笔记《郎潜纪闻》里,

并加以发挥,举例说明:“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,昌黎之纪事提要、纂言钩玄,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。”

说到这里,意思大概已经清楚。说直接一点,就是身边要备一个小本子,看到好言语、好议论,即所谓“体面话头”者,就随手记录下来。

这虽然是一个笨办法,但非常实用。否则,文正公也不会郑重其事地写信告诉儿子了。

“抄撮体面话头”,说小一点,是积累资料;说大一点,就是一种治学的方法。前人许多不朽的著作,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。

《日知录》,是顾炎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。后人评论它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,开启了一代健实的新学风。

羞羞答答答言“抄撮”,遮遮掩掩地不肯承认这一点,行文不加引号、不标出处,好像以此宣示“言必己出”、博学多才。

清代的另一位学人说过:士人至今日,凡作诗作文,俱不能出古人范围,即有所见,以为创获,而不知为古人所已言。惟随时记事,或考论前人行得失,有益于世道人心者……不至于虚其所学。

所以,文人作文,也和武人习武一样,都必须老老实实,“知之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,一是一,二是二,不会的就说不会,不懂的不要装懂,靠投机取巧掩人耳目,靠哗众取宠博一己之名,是行不通的。

真是古今人情相去不远。为了自己这“抄撮”的底牌被人摸去,差点打起来的都有。《世堂杂忆》的作者刘禹生说:

章太炎有手抄秘本数十册,蝇头小楷,极精善,记的都是汉魏以前最好文调。作者说,他写的文章之所以渊雅古茂,是有本源的。有一次,作者与其他几个人发现了这个秘密,差点再得动武。

有一天,太炎为人作文,作者看到其中有一句话,对太炎说:这不是先生从《四书》里套用的吗?太炎听了,怒目而视。

可见,大家也是从“抄撮”做起,慢慢成为大学问家的。而如此秘不示人,也可见他们是多么看重这些“体面话头”了!